

散文的文体难度来自于“真”

□耿立

真实是散文写作的第一伦理,散文文体的价值和散文的为文基础是真实。这种真实,既是作者个人层面的主观问题,也是散文文体的客观要求,是作者与读者签的一份文体契约,这个契约的第一款就是真实。

但这也不是说散文排斥想象,所谓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这样的想象,能使散文飞翔,语言活泼,结构多样,增加文体的广度深度,但散文的想象是有边界的,就是不能堕入虚构的范畴。

在各种文体的约定俗成的阅读习惯里,小说是虚构的,这种虚构,包括人物、事件、场景都是子虚乌有,在客观世界是无法对应的。而散文这个文体讲究真实的身份、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感情,这是散文文体的规定性。

相比其他文体,散文依赖的是真实,散文要的是真相,而不是其他。但由于作者的内在考量,比如为尊者、长者或本人讳,甚至只是内心的懦弱与恐惧,很多时候,是作者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不敢面对自己亲历亲见或知道的真实而采取鲁迅先生所说的“瞒与骗”,不说出真相,不贴近真实,而是留白,绕圈子,故意让真相消失,远离真实。

还有一些散文作者借助读者对散文文体的真实性的认知而夹藏私货,这样的作者很聪明,头脑灵活,他们知道,世界上很多低级谎言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这样的假话如果出现在散文里,那读者会一眼看穿;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另一种手段和手法,这也是谎言,这种谎言就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这样的方法在一些高明的散文写作中大量存在。

目前的散文写作,从结构、叙述和描写到细节刻画,很多借鉴小说的技术和手法来丰富散文的表现,但不能忘记,散文和小说是有边界的,小说是虚拟的,无论场景还是人物,而散文是已有的或正在发生的生活的事实和场域,有的散文是过往和回忆,这里的散文写作就面临着如何复原过去的门槛,因为记忆的碎片化和一些人物、事件的迷糊,写作的时候,免不了要用作者的想象进行还原。这种还原是基于真实的存在,这种想象是一种黏合剂,是黏合起那些过往的碎片,那些吉光片羽,是对真实的补充,是真实的桥梁,而不是推倒真实,也不是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事件,另起炉灶。这是散文与小说的分野,也是散文想象的边界。

但现在的散文写作,很多是突破了想象的边界,而进入了虚构的境地。我内心不由赞叹,这个话题曾争论了多年,赞成虚构的人说,文学就是以假定和虚构为手段的,散文是文学,所以,散文也可以虚构;有的人说,虚构是为了更好的真实;有的人说,真实在读者那里,你写的事实再真,由于技术问题,读者不买账,觉得是假,那就是假。但我的态度是,我反对叙事、写人散文的虚构,我认为,不能利用读者对散文的真实的

想象是有边界的,散文的真实就是想象的边界;散文的虚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边的虚构,不是捕风捉影,不应该用无中生有的虚构来冒充真实

信,或者是欺辱读者的判断,以不存在的人物、事件来冒充真实。读者对一些象征性、寓言性的散文的虚构性是有明确判断的;而对一些历史散文,读者也是允许作者的想象来进行补充的,就像是司马迁的《鸿门宴》,虽然司马迁并不在场,但他把项羽的幼稚天真、沽名钓誉、寡谋轻信,刘邦的头脑清晰、善于用人、多谋奸诈,范增的老谋深算,樊哙的勇武,张良的多智等,都在现场的细节里加以生动展示,这样的历史散文中,人物是真实的,事件也是真实的,而一些细节我们是无法考究和考证的,但读者对这些想象或者虚构心知肚明,也可以接受。关键在于,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虚构人物,也没有虚构事件,而是基于历史真实之上的文学创作,所以我认为,《鸿门宴》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司马迁的虚构。

近年来有人在写作散文时,以“文章”为名虚构辩护,主张回到小说、散文概念尚未清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散文和小说这两大文体就已经从“文章”里各自独立出来,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虚构。我认为在今天的散文写作中,如果作者不标出自己是借散文的真实来虚构事件、虚构人物,那么就是提前将其视为真实而讲述出来的,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作伪”,甚至可以说超越了散文的伦理,是一种写作中的巧妙欺瞒。我们知道,想象是有边界的,散文的真实就是想象的边界;散文的虚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边的虚构,不是捕风捉影,不应该用无中生有的虚构来冒充真实。

散文允许想象,允许情感的错位和变形。散文无法百分之百还原现场,但自己不能为虚构而虚构,我们必须明确散文写作的边界,一个散文写作者要真诚,散文和散文家的伦理就是真,就是要避免虚假,给人呈现人

格的真、精神的真、话语的真。“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真实性是散文默认的内在逻辑,这几乎是它的文体魅力所在。它当然也会产生相关问题,但这些问题只能从内部寻求破译。小说正是因虚构特征而成立的,今天的散文对于小说文体的趋附,放在文体史的层面上来看,对散文的发展是有害而无利的。

散文可以借鉴小说的艺术表现,但必须警惕散文滑向故事,故事不仅容易迎合读者,也容易包裹自身,散文是一种私密性和精神性很强的文体,对叙事的过度依仗会遮蔽其他能力,比如自省,比如智性。散文仅以故事取胜,这是一种讨巧,也是一步险棋,与小说相比,与传奇相比,散文还是要在洞见自我、烛照尘世的精神性上用力。

散文的文体难度和尊严,来自于真,来自于诚实。散文最高境界应是人格的境界,不是修辞境界!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能否保证对真实真相的追求,面对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不撒谎,对时代和历史不撒谎。当一个散文家没有失去求真的精神,没有失去精神的诚实性,对一些不堪和自己的丑陋回避,在生命诚实、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上下功夫,那么散文的尊严就会建立起来,在散文中,真比美更重要,而这不仅仅是散文的难度,也不仅仅是修辞的难度。

散文的伦理中,真比美更重要!

(作者系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教授)



■关注

百感交集之中,读完祝勇这本极具分量的新作。虽是新作,写的却是旧事。虽是旧事,却是之前我不曾深入了解过的一段历史。它非个人的历史,亦非国家的历史,而是一段文化史一段精神史。透过这段历史,个人与国家在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的命运隐约浮现其中。读毕掩卷,仍觉荡气回肠。

基于丰富珍稀史料的调查考证所构建出来的强烈现场感,阅读《故宫文物南迁》一书感觉如同一部纪录片在眼前放映,淹没于历史尘埃深处的画面重又清晰显现,几乎让人不知不觉重回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恍惚之中,听见敌机在头顶轰鸣盘旋,炸弹枪炮隆隆作响,流民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中混杂有老幼病残的哭泣与叹息……然而,在如此的兵荒马乱与喧嚣动荡中,却却始终能够听到一种低沉又镇定、坚毅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流离颠沛途中南迁文物的每一次奇迹般的幸存,这个以强烈信念托底的声音,让故宫文物在南迁途中一次次转危为安,让饱经风吹雨蚀的中华文明屹立不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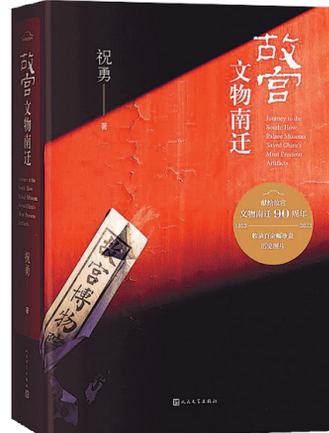
在书中,祝勇有力且被情感浸润的文字让读者瞬间进入历史现场,与以丹心碧血护送国宝南迁的前辈们同行。我们由此亦看到文字记录的意义所在,深刻感受文字所承载的责任、尊严与重量。一段鲜活的历史可借由力透纸背的书写如实还原,那些凝聚了先祖审美与智慧的国宝更是如此。护送文物南迁的前辈们几乎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之事,他们经受的是来自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挑战。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战乱动荡之时,在历史翻云覆雨之中,他们保全自己的同时,更以超越一切的信念、意志与行动照亮旁人。他们不但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克服了考验,更以身作则让人明白,文物的价值并不轻于人的生命,甚至远远超越于脆弱短暂的内身。

文明是刻在国人精神深处的印迹,是日夜不息流淌于国人血脉之中的基因。故宫的文物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象征,证明我们的先祖曾经创造过无上的辉煌和耀眼的成就。当我们的目光从那些华美沧桑的宝物身上徐徐掠过,我们与先祖的心灵与脉动在同一时刻感应共振。如果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失去保护,我们将如何去寻找自己的历史,寻找作为华夏子孙的认同与自信?

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极大敬畏,祝勇笔下的故宫前辈们踏上了南迁之路。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即便纷飞炮火如影随形,流离颠沛之中,那个年代学人的内心却始终能够抱有信念与热忱,秉持着对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坚定自信渡过了所有难关。扣人心弦的旅途之中,书中记录的几次海内外艺展是为数不多激动人心又令人宽心慰藉的时刻。动荡时局之下,故宫前辈仍能排除万难,誓愿让国宝远渡重洋、大放异彩,给人带来何等强烈的鼓舞与勇气。此时,承载国家文明的一件具体的宝物已经变成一种超越种族与国界的力量,仿佛在向所有战乱之下疲惫彷徨的灵魂证明,当前难关我们决然可以渡过,穿越数千年岁月与你相逢的我便是明证。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故宫文物南迁》,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短评

跨越世纪的家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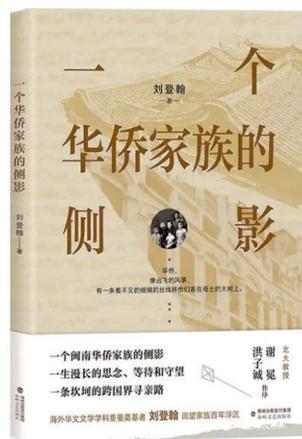
——评刘登翰《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

□赵舟敏

世界播迁的背景下,久经年月的往事与家族绵延有何悲喜交集?一生爱国、半生漂泊的华侨家族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曲折故事?在散文集《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中,作者刘登翰结合其个人经历、族谱史料以及地方性文献,深度探索了在大移民时代中家族过番的艰难历程,记录了作者在不同阶段与厦门之间的紧密连接,更借助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地域特色的叙事凸显了深沉的家国情怀。散文集配发的不少20世纪初以来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代学人在耄耋之年的深沉情思。

这部散文集分为“华侨家世”与“厦门往事”两部分。前者追溯了家族延续百多年的、代代相承的过番移民传统,将自己家庭悲欢离合的写照作为华侨家庭聚离合散的一个侧影;后者记录了家族迁居后关于厦门的都市记忆,通过一个个家庭的过番移民经历和华侨的归国经历,烛照闽南侨乡侨文化的丰富面貌。作为旁观者与参与者,刘登翰以温暖的笔触,表达对家族的尊重与怀念、对历史的敬畏与探索。娓娓道来的故事中融合了家族史与社会变迁,将小个体与大历史紧密结合,并引入“一带一路”的宏大背景,凸显了华人华侨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大趋势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贡献”。

“家族情感”作为核心的主题贯穿全书。这种感情并不仅是简单的情感回忆,更是与家族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文化交织及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家族的异域历程,特别是先辈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如何面对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矛盾以及生活的种种困境,却依旧紧密连接、守望相助、共渡难关。家族的点滴记忆,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纽带。书中母亲的形象尤为显著,她不仅是家庭的支柱,更是家族情感的核心,虽然承受着重重的生活压力,但始终坚守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族传统的维系,她的形象成为了母性坚韧与华侨家族情感



《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刘登翰著,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年

纽带的生动体现。通过对亲人的怀念,作者深情展现了家族的核心价值和情感基石。这种情感不仅是他们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支撑,更是他们在历史洪流中坚守的力量源泉。“家族情感”的深度与宽度,展示了华人华侨对家族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怀念、尊重与传承。

其次,“个体生命的尊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展现出来。无论是在异国他乡的艰难生活,还是在归国后的重建家园中,家人们始终坚定自己的价值观,呈现出华侨家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坚定和勇气。他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自力更生、奋发向前,更在精神层面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信仰。即使在最困苦的时候,也不放弃对自己、对家庭、对民族的责任和忠诚。这种对个体尊严的描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华侨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

书中的厦门,作为家族的历史和传统的

承载者,同时也作为家族的发源地和集结点,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作者对厦门的描述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透过“都市记忆”深入挖掘着家族与故乡之间的情感密码。在作者笔下,厦门被塑造为家族的情感“锚点”。通过细致地描绘厦门的历史面貌和家族的生活经历,既展示了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与这座城市深度融合,又体现了家族在风云变幻中如何紧密地保持与故土的情感联系;与此同时,作者还生动描述了家族成员如何在厦门这片土地上开展商业活动,与当地社群建立联系以及在面对时代洪流和社会考验时如何坚守初心;最后,透过“酸楚与疼痛”,作者深刻地揭示了家族成员如何将对故乡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动力,帮助他们在异国他乡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这种对故乡的深情厚意,不仅是对一片土地的眷恋,更是对家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家族价值观的坚守,它与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家族经历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情感。

除了可以让读者感受多维立体的情感外,散文集也呈现出刘登翰作为一名亲历者的洞见。这种文化视角不仅基于历史学者或文化研究者的冷静分析,更因结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高度概括与独立发现,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和感染力。书中充满了高度的思辨性,既关注了家族和侨文化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同时也深入挖掘了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这种思维方式囊括了家族过去的辉煌与繁荣,同时也并不回避家族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考验。“悲喜共存”的情感纽带并非简单的情感叙事,而是展现了作者对家族历史与华侨文化的复杂评价与深刻理解。这种辩证思维,让作者在探索华侨文化的跨越地域性和多样性时,准确地捕捉到了华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独特境遇,使读者能够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华侨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作者系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第一感受

颖川《火花集》

童心未泯的老翁

□袁学骏

颖川先生已近九秩,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已有70余年,乃河北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近日读到他的新著《火花集》,似乎迎面扑来一股青春气息,如见一位白发哲人向我们提示着生命与生活的真谛。我内心不由赞叹。这位应该颐养天年的老翁,竟有如此情趣、如此心志,实在难能可贵、令人崇敬。《火花集》收入先生无题小诗169首,多为四五行,他自称为“极短章”。主要是咏物抒情和直抒胸臆两类,共同特点是精致而富有哲意,有的完全可以称为格言警句。

首先说其咏物诗。先生人老心不闲,他是见物生情,逢物有思。例如第1首:“我的寂静的燕斋内/这对跃跃欲飞的白天鹅,/不是爱神/丘比特的化身么?”燕斋是他小院的雅称,源自他的大名刘维燕。他观察这一对雕塑白天鹅,联想到欧洲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发出设问而让人去思考。第2首:“二月兰亮出的/紫色的星点小花,/赋予我的,/何止恬淡的绮思?”这是从兰花小朵发生的联想,可能想到很多,却留有读者再遐想的余地。

寄情于动植物、鱼鸟花卉,多用拟人的手法表达自己对自然万物和人的爱意,似在与它们对话交心,或表达对不同花木的褒贬,是这本诗集的一大特点。例如第69首:“阿尼特,我的麻雀小友!/渴望早日见到你/带着新娘子/飞来作客”作者不嫌弃这种十分平常的鸟儿,不但视之为友,还用童话中樱桃喊麻雀的爱称阿尼特,希望它早早成双成对地飞来。第71首:“一簇簇素白的梨花/尽收我的眼底。/这是诗的物化,/这是词的外表”则是对梨花之美的抒情描写。其第102首中,批判“本是狗屎

苔,/楞充灵芝草”,讽刺这是生物界狂妄者的“出色表现”,生动而形象。第103首又写道:“我的卧室的窗前,/有两种恋夜的秋花。/我待见清芬的玉簪,/我厌恶浓郁的夜丁香”这鲜明地表明了对不同花草的爱与憎,且具有讽喻人世的意味。其咏物诗涉及七八种动物和十种植物,皆是小中见大,微中见大,多有叩问、象征、隐喻的哲思,简洁而隽永,是古今中外咏物诗的新发展。

至于颖川先生直抒胸臆的小诗,一部分是他步入晚年后的生活态度,快活乐观;一部分是在创作上的心灵流露,特别集中地表达出了老而弥坚的文学信仰。

其第88首这样写道:“我把病魔直赶到/荒芜的一个小岛。我呐喊!/我跳跃!”这是先生与疾病抗争的心声。第90首:“知否知否?/生命之树的常青/源于人的/童心童趣。”这是先生的生命观、生存观。他要保持童心,在有的诗中便称重孙子是小顽童,自己是“老顽童”,显得那么快乐乐观。第89首:“我与梨花的恋情呀,/或可创作一部/别开生面的/浪漫的诗。”这是先生内心的梨花恋和因之激发出的创作欲望。在第109首中,先生这样发问:“朋友,你是否晓得?作家的神采与风貌/从来不受/年龄的制约?”他是用与人对话的方式,道出自己老当益壮、永不停笔的心迹。由此,不由想到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千古名言。先生的确是忠于生活、忠于文学的老骥,没有一点老气横秋的颜色,而是“青春永驻的作家”,是他自道的“童心未泯的老翁”。

颖川先生扎根于涿州,在集中还表达对蠡县故乡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珍重,对妻儿们的钟爱,对朋友的谨慎;也有作为作家对读者的尊重,对手中笔杆的亲昵。他也运用典故、讲古今中外作家诗人的人生和文学理念。他在浪漫的童话般的情愫中表达内宇宙的自我,在写真实中抒发对生命、生活和大自然的挚爱,对文学艺术的孜孜追求,且巧妙地恰如其分地对不良现象进行了否定或提醒。我读着颖川先生的集子,觉得一道道思想火花在迸溅,一阵阵盎然的春意随风发。温暖中有老辣,简约、精当中有深沉。这是他饱经风霜的哲人的生命力、洞察力的集中体现。(作者系河北省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